

新型城镇化与乡愁

周 星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¹⁾。城镇化促使中国普通国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的改善，促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人们在享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与城镇化进程伴随而来的各种弊端和“城市病”也愈加突出。作为对应，中国政府在2012年前后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尝试在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努力纠正此前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聚焦于“新型城镇化”理念及其实践中的“乡愁”要素，试图从“乡愁”这一较为感性或比较富于精神性和情感性的侧面，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的特点及方向。

城镇化与都市型生活方式

1949年末，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4%⁽²⁾；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镇化率也才仅有17.9%⁽³⁾。后者作为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之下城镇户籍人口的数据，如实地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严重受阻的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活性化，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带动了新形势下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起步；随后，中国的城镇化率便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有力举措的共同推动之下，逐年地得到了持续的提高。1995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29.04%，这意味着已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工作和生活

(1) 2021年3月26日，在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共同研究课题“思考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公开演讲会上，笔者以“新型城镇化与乡愁”为题做了讲演，并得到日野绿教授、松冈正子教授、唐燕霞教授、铃木规夫教授和叶继红教授等同行们的点评和指教。本文系根据此次讲演内容改写而成。

(2) 时在新中国的户籍制度确立之前，因此，这里是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 时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下，因此，这里是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到2011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工作和生活在城镇的人口比重超过了50%。到2019年末，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亦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60%；2019年的城镇常住人口为8.484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万人；而乡村常住人口为5.516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1239万人⁽⁴⁾。由此可知，中国城镇化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变化之剧烈均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很多复杂的难题，其中之一便是城乡二元格局在僵硬的户籍管理体制的支撑下很难被突破⁽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难以逆转的新阶段，城镇化进程也伴随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朝第二产业和三产业的转移，而实现了大跨度的发展。鉴于城市的就业机会远远高于农村，所以，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打工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现金收入，同时为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户籍之墙的阻隔，则使得全国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工⁽⁶⁾较少或难以享有城镇化的成果，有很多农民工即便在城市里获得就职的机会，也面临难以安居乐业或难以让子女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的尴尬处境。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他或她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奔波。

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率主要是指实际常住城镇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而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亦即拥有城镇居民户籍的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例如，2014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8%，但这一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9%；2018年末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但同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2019年末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但同年的户籍人口都市化率为45%。根据2021年5月10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自2014至2020年底，约有1.1亿流动人口领取了居住证，1.2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达45.4%。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数据的差异表明，很多已经在城镇里工作和生活的新市民，还没有获得所在城镇的户籍，因此，也就无法享有和户籍捆

(4)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1月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2019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通报。

(5) 秦兆雄：「中国の都市農村二元構造論再考」、『神戸外大論叢』第49巻第4号、第41-63頁、1998年9月。

(6) 2012年中国农民工的人数为2.6亿；2014年的农民工人数约为2.5亿左右。

绑在一起的各种政策红利⁽⁷⁾。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没有获得所在城镇的户籍而在就业和薪资等方面受到不公平的遭遇⁽⁸⁾。虽然，多年来户籍制度的渐进改革，已经使得此前的城乡关系的张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迅速增加的新市民无法获得公正和平等的对待，不能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这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也容易导致产生很多其他问题。

都市化或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较短时期内朝大中城市迅速聚集，这个过程中既伴随着乡村的人口过疏化，也伴随着城镇的人口过密化。多年来，中国的城镇人口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左右，这自然给城镇的公共体系带来了巨大而又持续的压力。早在198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就曾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见解⁽⁹⁾，预见到人口高度集中到大中城市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病，他为中国的城镇化提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亦即通过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在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高度集中的问题。换言之，通过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可以相对就地、就近地实现城镇化，而不使人口朝大中城市过度聚集。多年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和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费孝通的高瞻远瞩。从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乡村—都市连续体”（folk-urban continuum）理论，到柳田国男的“都鄙连续论”，再到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先贤学者们所揭示的城乡关系是两者处于持续互动之中，甚或形成农工结合体，乡村的文化变迁受到都市深刻的影响，并不存在绝然孤立于都市的乡村⁽¹⁰⁾。小城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处在都市和乡村之间，是两者的接点和枢纽；也因此，它既是城镇化的起点，也应是城镇化最终落实的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是指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就同时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一般国民的居住及迁徙自由能够与之相配套。但由于户籍等城乡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壁垒，从农民工的实际体验来看，他们

(7) 陆益龙：《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第162-1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语文。

(8) 馬欣欣：「中国における出稼ぎ労働者と都市户籍住民間の賃金格差」、『中国21』第53号、2020年9月。

(9)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编：《小城镇 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10) 鶴見和子：「柳田国男の都鄙連続論—費孝通、レッドフィールド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民俗学研究所紀要』第15号、1991年3月。

实际上先后或分别经历了“离土(农业)不离乡”(在本地乡镇企业就职)、“离土又离乡”(进城打工)、“离乡不离土”(到发达地区承接农业活路)等多种生活形态,可以说是奔波和纠结于城乡之间,难以安顿下来。近些年来,中国的都市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除了因城市面积扩容导致的“郊区城镇化”、劳动者背井离乡的“远距离城镇化”,还有就是就近的“就地城镇化”⁽¹¹⁾。所谓“远距离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民工远离家乡去大中城市打拼,最后落户在那里,成为新市民的城镇化,显然这种城镇化的成本较高;所谓就地城镇化也就是就近、在地的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民在家乡本地的小城市,例如,县城或小城镇,通过购买商品单元楼而获得城镇户籍,由于县城或小城镇的户籍管理要开放的多,所以,就地城镇化的成本较低。社会学家发现了一种教育的城镇化现象,其实就是新一代农民为了让子女可以就近接受比乡村较好的初级和中级学校教育,所以,往往选择在县城或小城镇买房,进而实现就地或就近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其背景正是全国各地的县城和小城镇很多都升格为城市,就全国范围来看,数量约占全国近4万个基层乡镇总数54%的“建制镇”,因为承接了周围大量追求就地城镇化的本地乡村居民,从而成为“农村里的小都市”⁽¹²⁾。

和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相伴随的是房地产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持续繁荣,而农村出身的人们通过劳动所获,在城镇购买商品单元楼便成为他们突破户籍阻碍而成为新市民的基本路径。乡民们经由在本地的县城或家乡附近的小城镇购买不动产,除了获得城镇户籍和新市民的身份之外,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可以拥有都市型或城镇型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将这种趋势视为“都市型生活方式”在广大乡村也不断得以推进的表现,从民俗学的立场看,农民入住位于城镇的单元楼房的生活,自然也就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都市型的生活方式,亦即实现了自己人生中的“生活革命”⁽¹³⁾。战后日本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1955-1975)之后,于1960-70年代出现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生活革命”;在此,我们借用“生活革命”这一用语来描述中国社会因为城镇化进程而得以实现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变。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

(11) 朱宇:《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12) 小島麗逸:「中国の都市化と小都市・町の盛衰」、『アジア経済』第46巻第10号、第26-65頁、2005年10月。

(13) 周星:“中国人的生活革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11日。

情形，我们把“生活革命”在中国定义为都市型生活方式的确立及普及，所谓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就是指以单元楼房的居住生活为基本模式的日常，它的普及目前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当然，与城镇化进程有关的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变迁，还有很多其他的层面，以“衣食住行”中的交通为例，已经获得实质性进展的交通革命，带来了全国面貌的焕然一新。覆盖全国所有村落的公路“村村通”工程，位居世界前列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中国作为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汽车社会，一般国民的汽车保有量激增，摩托车、农用车和小轿车在广大乡村也开始普及。此外，还有全国规模的新农村建设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即便是偏僻的乡村，也都程度不等地和附近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联系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城乡一体化的水平。

城镇化带来了国民生活方式的巨变，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伴生的各种弊害也非常明显。例如，农村的过疏化、村落的空洞化、留守儿童和远离家庭的问题；包括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在内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滞后且排挤外来者的公共服务、地域歧视和对农民工及新市民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备等等，可以说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成为都市社会的边缘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多不愿或无法回归乡村社会，从而形成了双重的边缘状态⁽¹⁴⁾；也因此，他或她们普遍面临严重的焦虑状态，有较多的心理卫生困扰⁽¹⁵⁾。此外，还有不成熟的汽车社会每年都带来的重大伤亡，以及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和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厕所问题和垃圾问题等等。大中城市里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崛起，一方面引导了社会的消费趋势，但其欲望导向的行为模式也影响到全社会的价值取向。除了针对被视为“他者”的国内移民（尤其是来自外地乡村的劳动者）的排斥与歧视⁽¹⁶⁾之外，“新市民”如何适应城镇生活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为了应对和化解上述与城镇化进程伴生的社会问题，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城镇化，尤其是实现覆盖广大乡村却不以农业、农民、农村为代价，并使得城市和农村均享有均等公共服务的城镇化，进一步还必须是保全环境、

(14) 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8期。

(15) 周大明：《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第20-2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

(16) 川口幸大、堀江未央编著：『中国的国内移动——内なる他者との邂逅』、第2-21页、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20年12月。

不以生态资源为牺牲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针对已经存在的问题和弊害，中国政府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遂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以为补救。

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目标，认为中国城镇化应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发展新阶段，亦即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关键领域在内且又相互配套的综合性改革，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速度和规模。此种新型城镇化，要求大城市的城市管理更加精细，也要求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加速发展，并促使城市群建设和城市的区域分布更加均衡。随后，在2013-2014年间，中国政府相继发布了《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文件，并先后于2014年12月，2015年11月、2016年11月，相继公布了三批次国家新型都市化综合试点城市的清单。这些清单既包括发达省份，也涉及欠发达省份；既有重要的省会城市，如石家庄、武汉、广州等，也有较为重要的中等城市，如宁波、大连、青岛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涵盖了大量的地级市（区）和县级市（区、县），甚至还有编制镇等；此外，既对南北有所兼顾，也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有所平衡。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基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重视对广大乡村的覆盖，重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展。在中国存在着事实上的都市行政等级制的状况下，重视地方城市，亦即“地级市”、“县级市”以及建制镇的理念，正是新型城镇化的崭新之处。

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尤其强调了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2016年10月，国务院颁布《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并提出具体目标，亦即在“十三五”期间，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这意味着年均需要转户1300万人以上。这个举措旨在进一步破除城乡及区域间的户籍壁垒，经由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显然，此种突破最容易、也最应该首先在基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获得进展，从而实质性地助推在地城镇化并使之落在实处。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及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同年4月，在国家发改委提出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仍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城镇化的分布；随

后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要求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在县城就职、移居，就地或就近成为新市民的愿望。所有这些均意味着自2012年提出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以来，中国政府的相关努力一直没有停顿，现在已经落实到县城一级，并与就地城镇化的趋势形成了较好的互动。

乡愁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理念

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要通过城乡统筹，实现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从而彻底缓解城乡二元对峙或区隔的局面。具体而言，需要通过促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均衡发展和良性的产业互动，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集约性效率，包括社会和经济多个层面的效率；还需要促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之间的平衡发展与相互影响。换言之，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指向缩小城乡差距、化解都市病、使城乡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其中还包括实现“人”的城镇化，例如，新型城镇化必须同时实现针对新市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它还应该是社区居住环境优美且生态可持续宜居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还突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亦即“乡愁”。召开于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表述，此种非常感性的表述在官方文件中并不常见，因此，也就分外引人注目。使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镇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自然也就意味着新型城镇化需要保护好自然风貌、需要保护好城镇的历史传承与文化记忆，需要能够满足新市民的乡愁情感。这种表述意味着推进新型城镇化，不应该是截至目前普遍存在的大拆大建，不能再搞“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不动产大开发，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因地制宜的特色城镇化，以及与环境生态亲和的城镇化。如此的城镇化如果与其周边的美丽乡村建设配套实施⁽¹⁷⁾，就有可能在维持传统的村镇分布格局的前提下，极大改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环境与生态，从而全面提升乡村城镇化的品质。

(17) 陈志勤：“村落环境治理的传统机制缺失——来自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6期。

从2015年元旦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发起,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系列纪录片《记住乡愁》正式开播,并迅速引起巨大反响。这套讲述全国各个地方的乡土故事,追忆改革开放以前或城镇化之前各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试图重新唤起地方历史记忆的纪录片,迄今已经连续播放了七季,长达7年之久。经由大众媒体大规模地展现乡愁,寓示着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已逐渐趋于解体,与此同时,以自然分工、自给自足、人情醇厚、慢节奏为特点的乡村生活世界也已经或正在迅速消失或发生变异和变迁。《记住乡愁》反复展示和讴歌的主要是乡土建筑的价值、古村镇的风情、邻里族人的人情世故、耕读文化以及儒商或儒农的价值,这些似乎是日益稀缺的传统价值,在当下的中国,正经由文化乡愁的机制而得以被重新认识。

实际上,在政府把受惠于城镇化的普通民众的乡愁能否得到慰藉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标准之一,大力推行这一全新的城镇化理念之前,大约从1990年代起,中国的知识界和公共媒体就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广泛和浓烈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乡愁,而1996年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系列和随后喷涌而出的有关古镇古村的大量出版物,可被视为是具有标志性的现象⁽¹⁸⁾。对于过往旧时的怀恋和追忆,对于传统的寻根和赞美,主张或呼吁发掘、保护以及传承传统文化的叙事话语,大约是在1990-2010年间,此类文化乡愁逐渐弥漫中国社会,并终于演变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和情绪性潮流。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怀旧和乡愁情绪的泛滥,其实是和不可逆转的城镇化进程及持续深化的生活革命密不可分的。1990年代,恰好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迅猛成长,小城镇建设持续推进,乡村面貌发生巨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时期;也正好是在这个时期,艺术家和文人雅士们似乎突然就“发现”了古村古镇及其将它们作为乡愁得以寄托的载体的价值。此后,古村古镇热迅速扩展到全国,直至2003年10月,由政府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清单。

知识分子的乡愁情怀,基本上和个人悲欢离合的命运关系不大,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表述的“中华民族的美丽乡愁”那样,它展现的主要是民族和家国情怀,基本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文明的乡愁。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

(18) 周星:“当代中国的生活革命与民俗学的‘乡愁’”,萧放、朱霞主编:《民俗学前沿研究》,第103-127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

无数具体个人离乡打拼所体验的乡愁，当然是要显得更加具象和深切。改革开放以来，长年奔波于家乡和打工城市之间，那千千万万普通的异乡打工人的乡愁，最为真实和明显地反映或体现在每年一度的“春运”上⁽¹⁹⁾。无论多么艰难和困苦，也无论打拼成功与否，“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承载着全体中国人共享共情的乡愁，承载着无数具体的个人和家庭通过阖家团圆这一质朴方式而得以满足和慰藉的幸福感。尽管几十年来，交通革命的成就使得从异乡回家的路途不再那么艰难和遥远，但年复一年的“春运”仍然是乡愁最为浓烈的表象。再有就是异地城镇化，亦即成功移居都市、成为新市民不久的规模多达数亿之多的原农民，他或她们对于“回不去”的家乡的眷恋和怀念。新市民和农村家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藕断丝连地以各种方式被绵延下来⁽²⁰⁾，而来自城镇生活的不安、不适、挫折、疏离感和压力等，也都需要以怀旧乡愁或类似的途径予以舒缓。

大中小城市的市民，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市民对于田园风景、诗意般乡居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成为中国社会近些年的一种趣向。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目前确实已经出现了从城镇化进程中乡民对城市的憧憬，逐渐地转变为市民对田园乡土感到向往的动态，可以说正在发生颇为明确的转变。之所以很快就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近郊或远郊，相继兴起了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农家乐、古村镇游等等诸如此类的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迎合都市中产阶级需要转换心情、调整生活节奏和获得心理满足的需求。这些可以让市民们当日往返的休闲、度假和观光的去处，其实就是中产阶级市民实现“充电”的社会装置或文化设施，而由于交通革命与汽车社会的形成，更是进一步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扩展了市民们可以外出游玩的乡村远郊的范围。若是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如此的乡下或古村镇俨然已是市民生活世界的另一个空间，犹如家乡作为乡愁的对象一样，这些得以重构的乡村（或相关的项目）正在成为市民们憧憬的对象空间，或是其想象中可以怡情或得到心理抚慰的“故乡”。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自1990年代以来，以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为典型集散地的旧货、古董等老物件，因应和了盛世收藏的潮流而迅速风

(19) 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第10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

(20) 真野俊和：『ふるさと』と民俗学、『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27)』、第303-328頁、1990年3月。

靡起来。这一热潮蔓延全国，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同时或相继形成了类似的据点，中国社会出现了对于所有古旧事物，例如，老房子、古村镇、老家具、老字号、老器物的追捧。固然也存在假古董趁机泛滥成灾的问题，但传统工艺品、古民具等传统事物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仍是值得赞许的文化动向。究其背景，自然可以联想到全国城乡居民的大乔迁，城镇化指向的大开发，不动产行业的野蛮生长，城市内部的棚户区改建等等。伴随着入居新单元楼房套间而得以实现的新的都市型的居住生活方式，大量的旧家具或老物件等的归宿或者是被抛弃成为垃圾，或者是在旧货市场获得新的生命，得以继续发挥其抚慰收藏者们怀旧情绪的新功能。

巨大社会的激荡性变迁，必然会在很多层面要求政府出台必要的政策予以应对。除了始于21世纪初的全国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外，几乎同时启动的还有对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清单的认定与公布。2003–2019年间，全国总计公布了7个批次的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487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务院还在2008年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作为管理它们的法规依据。更进一步，这个趋势还迅速扩展到对传统村落的保护，2014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在北京启动了“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大型项目，同时正式地开通了中国传统村落网。2012–2018年间，由建设部和文化部、财政部联合相继公布了5批次合计6799个中国传统村落，其分布涵盖了全国所有地区。对于古镇、古村和传统村落的重视，其背景主要就是受到知识界的文化乡愁氛围影响之下的“丧失性叙事”⁽²¹⁾，亦即对传统文化的流失高度敏感，把村落古镇视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母体，把它们认定为“中华民族美丽乡村”的寄托，并本质主义地相信它们若不再存在了，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将古村、古镇和传统村落遗产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范围的延展，检讨古村镇和传统村落的认定标准或条件⁽²²⁾，可知其就是来自“文物”概念的扩大化解释。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和文脉之中，丽江的大研镇、山西的平遥古城，以及宏村、西递等甚至被升格为世

(21) 刘正爱：“谁的文化？谁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认知困境与理性回归”，《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22) 方明、薛玉峰、熊燕编著：《历史文化村镇继承与发展指南》，第32–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汪欣：《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徽州传统村落为个案》，第40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6月。

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存在。经由文化遗产行政的一系列操作,使得现存的乡镇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认定,曾经被认为是封建、闭塞、落后、需要变革的存在,甚至一度成为“破四旧”的对象;现在摇身一变成为文化遗产,成为讴歌、赞美和需要保护的對象。古村镇及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化,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还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可供开发的资源或可供鉴赏的景观,亦即成为欣赏、观光和满足很多人士的文化乡愁的所在。

实际上,文物、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展和寻找或发现美丽乡愁得以寄托之对象的努力,并不只指向乡村,从1982至2018年,国务院相继认定了4个批次共计135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自从2015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国第一批30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以来,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均相继推出了省级、市级的历史文化街区或更为微观的优秀历史建筑等清单。所谓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在城市里相对较为集中地分布着历史传统建筑或旧时景观的地区,其作为文化空间的风貌具有该城市曾经的一些特点。也正是基于这些资源,各大中都市的“古文化街”得以重建再兴,用来满足市民们的乡愁或思古之幽情。

乡愁的能动性：愈合城乡裂痕

乡愁是人类具有普适性的一种情感,但它的属性和蕴涵却较为复杂,既有身处异国他乡对于祖国家乡的缅怀,又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对于旧时过往人事的怀旧,甚至还包括成人老后的个人对于自身儿时或青春时代的回忆。总之,时间、空间和人世间的阻断或隔离,均有可能导致怀古、怀旧、怀念以及遗憾、遗恨、失落之类的情绪反应。城镇化了的新市民对于曾经的乡村生活的缅怀,实现了生活革命的当代中国民众对于过往逝去的艰苦朴素的日常生活的怀旧,当然还有追寻中国传统文化“原乡”,自诩为中华民族守护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们的哀愁与感伤,乡愁显然是具有多个层次与面向。但由于乡愁往往是无法本质主义地获得实现的,因此,即便是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行政,也只能是感性地希望让城镇化了的居民们能够“记得住乡愁”而已。

乡愁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在中国,它同时也算的上是具有当下时代性的现象。犹如日本民俗学界当年意识到的课题,包括都市化和故乡意识的变化、

农村生活变迁和农地开发、团地社区和生活革命的关系、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憧憬等等一样，中国的城镇化及其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剧变，城镇新居民的市民化等，也非常自然、如影随形地引发了乡愁情绪的迸发和蔓延。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相继出现或同时生发的与表现或满足人们乡愁情绪的社会文化现象很多，例如，除了上述的古村镇热潮之外，还有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兴起并普及全国的“农家乐”现象和民俗旅游的发展。

“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买农副产品，体验农家生活”，承接前来享受农家乐趣的人们得到了各种满足。农户经营“农家乐”的辛苦劳累在被省略或忽视之后，展示给来客的当然就是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慢节奏农家小院生活、质朴温暖的人际关系以及健康朴素的食物。“农家乐”项目所营造的乡村印象，迎合了中产阶级市民对于农家欢乐或趣味的想象。截至目前，“农家乐”主要是在政府工作的文脉之中得到关注、研究和定位的，诸如乡村旅游、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或扶贫、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等等，但其实，它作为一种乡村旅游模式，某种意义上，也是因应和满足游客们的乡愁所需而人为建构的⁽²³⁾。“农家乐”展示给市民游客的并非真实的农村，而是迎合了他们的期许，是经过多种资源整合的途径而特别塑造出来的农村。但无论如何，“农家乐”的意义远不止如此。例如，它以民俗文化为资源，成为开发乡村经济的模式之一，有助于改善“三农”的境遇；它部分地成为乡村发展的示范，把现阶段人们对理想乡村生活的期许具象化；有时候，它或许成为市民优越感的再产生机制，但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都市居民的乡村认知和印象均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还有，它作为满足部分市民的田园憧憬和乡愁怀旧情怀的设施，实际上和古村镇的功能也颇为类似。

类似的例子，还有“农民画”。这种起源于合作社、人民公社时代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宣传艺术，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城镇化进程取得决定性成就的当下，明显地拥有了新的动力机制，亦即满足中国社会大面积城镇化的趋势下，以乡愁为指向的大众文化消费⁽²⁴⁾。基本上农民并不消费农民画，消费农民画的主要是城镇化了的市民；农民画被用来满足某些场景下理想化的乡村氛围的酿成。可以说，乡愁的审美性非常适宜于用农民画来表象，恬淡平和的农家生活、乡村风情、与大自然和谐的文化景观等等，农民画的题

(23) 周星：“‘农家乐’与民俗主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

(24) 周星：“中国农民画的发展趋向与新的可能性”，《东方论坛》2021年第1期。

材非常契合人们对美丽乡村的理想。正如卢县农民画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城里一个家，农村一个家”，农民画作者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当下往来越境于城乡之间的那些新市民的心境。

上述都市对于“乡土”的消费，表明乡愁具有能动性，它能够推动使其得以寄托的载体或对象目标实体化或具象化。因此，我们说乡愁具有推动或成就很多文化实践的力量。无怪乎各种象征或符号化的人工物、古董、旧货、民俗文物、传统民具等等，被布置在市内的老街、老店，或被安置在郊外农村或古村古镇。以怀旧和乡愁为主题的各种商品，被乡愁商品化了的例子，在当下的中国比比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为市民休闲的去处，作为现代社会在精神和情感方面获得补偿的机制而发挥装饰、点缀日常生活的功能。为了满足乡愁情绪的驱动，人们会将很多过往旧时的事物按照当下的需求而再生产出来，这个过程当然就有取舍选择，但最终都是将其纳入现代都市型生活方式之中，使之成为现代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基于乡愁的审美性，亦即乡愁具有把过往旧时、把乡村文化、把传统予以美化的趋向，旨在满足乡愁消费的大量文化设施，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迎合此种审美倾向的事实。例如，江南水乡众多古镇的重新建构，大都具有明显的审美化取向，水乡古镇的浪漫化氛围，主要是经由修桥修路、速通河流、整备街景等举措才得以形成全新的样貌。如此的水乡古镇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古镇了，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满足外来他者的文化乡愁的装置而具备了新的意义。实际上，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特色小镇建设，被视为是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但无论是基于当地何种资源优势形成了哪些特色产业，其对环境宜居、生态美丽以及居民能够“记得住乡愁”的要求却都颇为一致。由于人们和乡愁有关的想象往往较为相似，所以，为满足乡愁而人为建构或改造的小镇就很容易因相互模仿、复制而趋于雷同。

把传统理想化，把历史浪漫化，把过往人事美化，是乡愁追求的常态。如此被用来满足美丽乡村的设施往往也内涵着很多悖论。在地居民追求现代生活，他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必须要有交通、采光、照明、卫生、安全、社区服务等多方面的大幅度改善，同时为了游客进出和享受的便利，大规模的硬件改造和基础设施提升在所难免，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同时适合于呈现传统的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呈现出作为怀旧的对象需要发散的氛围。通常是要为前来的游客提供一个供其“发现”或文化消费的清单，这个清单也就意

味着对当地的文化传统和过往人事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诠释，其中有传统建筑、纪念物、古迹、名人故居之类的文化景观，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仪式、民俗艺术和口承艺术的提示，或许还有博物馆式的展示。作为提供体验的场所、空间与设施，需要对上述两个方面均有较好的兼容，才能够成为吸引游人的旅游目的地，成为中产阶层市民乡愁消费的对象，成为怀旧商品的大展场和大卖场。

在以中产阶层市民为主体的游客他者的视野中，可诗意地栖居的村镇整体如在画中，或如世外桃源一般地令人向往，但这是浪漫的误解。无论是古村镇，还是传统村落，无论是“农家乐”，还是农民画，它们都需要在新型城镇化驱动的大背景下，在城乡互动的关联性之中，才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需要承接乡愁怀旧情怀或理念的载体与形式，便是重新建构出来的“故乡”或“乡土”。“故乡”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从城市和农村的联系之中产生的，各级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主导了各个地方社会亦即“故乡”的再造。人们以“故乡”的名义重新建构地域社会，人们也经由对“故乡”的再发现，想象并试图重构理想的世外桃源般的社会。如此的“故乡”与乡愁眼下正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及使之对象化和相对化的研究。

乡愁情绪的涌动所形成的力量，部分地来自它的批判性，因为乡愁怀旧往往就是对当下现实的失望、失落、不满、不安、不快或不确定性的抵触、逆反甚或反抗。越是急剧变动的社会和时代，就越会频繁地发生此类情绪。城镇化进程稀释了乡村生活的价值，催化了乡土社会的解体，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淡化；乡愁所追求和浪漫化的价值方向则是要回归过去，常常以乡村重建或对传统的返璞归真表现出来。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常把乡愁视为现代性批判的工具。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新兴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志趣，以乡愁为特点；乡愁情绪下人们热衷的丧失性叙事，又成为乡愁所钟意的各种价值的论证依据。对旧时的集体性怀旧和乡愁，成为各种遗产化动向的基本驱动力，甚至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灵依托。

如果我们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和生活革命的延长线上思考问题，那就不难理解新型城镇化为何必须是民众的乡愁情绪得到慰藉的城镇化。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基于对此前城镇化所存在问题所作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愈合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格局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裂痕所必要的选择。我们时刻也不应忘记，中国社会因为城乡关系的长期对峙而形成的裂痕依然是一

个基本和重要的事实，乡愁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以及文化乡愁对于愈合社会创伤所具有的意义，才是我们特别关注它的理由。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可以满足或慰藉乡愁的大量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文化设施的建设，都将有助于迅速和有效地治愈城乡对峙格局的后遗症，从而也都是中国迈向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生活的必经之途。

小结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最近出现了似乎是“逆”城镇化的一些现象。不少地方的城市净流入的乡村人口逐渐减少，甚或由正转负；有些城镇退休人员选择返乡养老；有些中产阶级人士选择环境生态指标更好的乡镇生活等等。显然，如果没有新型城镇化对于新市民的各种关照，那么，农民工返乡的意愿就有可能增强。但这种所谓的“逆”城镇化，和计划经济时代诸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类的“反”城镇化绝然不同，它其实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又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是有部分城市人口向远郊或乡镇移动，但这并非回到城镇化之前的状态，而是城镇化得以实现之后，都市型生活方式朝乡村基层进一步延展普及的一种方式。即便是回流农民工，他们对于流出地的城镇化依然是建设性的力量⁽²⁵⁾。假如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全国数万乡镇有可能因承接“逆”向而来的人口而得以繁荣，那么，此种繁荣便是新型城镇化所期许的繁荣。正如社会学家李培林指出的那样，此种“逆”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相一致，亦即人在远郊或乡村，依然可以享有城市的生活品质，同时还能够看得见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换言之，除了“村落城镇化”，还应该有“城镇村落化”⁽²⁶⁾，我们所理想的城乡一体化追求的目标不是把所有农村均变成城市，而是要将城乡均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让农民可以享有与市民平等的社会服务与生活品质，同时还能够保持好的生态环境与田园风光⁽²⁷⁾。如此看来，“逆”城镇化不是以“三农”的牺牲为代价，而是乡村城镇化的升级版。

(25) 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第31-3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

(26) 岳永逸：“从‘村落城镇化’到‘城镇村落化’”，《新产经》2014年第1期。

(27) 李培林：“新型城镇化与突破‘胡焕庸线’”，《人民日报》2015年1月8日。

Summary

New Urbanization and Nostalgia

ZHOU X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sustained 40 year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large-scale urbanization process.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and makes great changes in people's daily life style. However, various drawbacks and "urban diseases" accompanied 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s a respon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2010s, trying to further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deal with these various problems that have appeared before. Focusing on the concep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elements of "nostalgia" in the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quire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re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from the more perceptual or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nostalgia". While pointing out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nostalgia" for the "new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also reveals the positive role of its initiative in healing the deep cracks between urban areas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Urban daily life styl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Nostalgia